



五百年來 誰著史

中国出版政府奖、
中华优秀出版物奖、
中国好书奖得主代表作
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推荐图书
2010年度全国优秀图书排行榜榜首

1500年
以来的中国与世界

韩毓海——著

作者三度修订，精益求精，
带你重温波澜壮阔的中国改革

五 程



五百年來誰著史

1500年以來的中國與世界

韓毓海——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五百年来谁著史: 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 / 韩毓海著. --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8.7
ISBN 978-7-5086-8904-3

I. ①五… II. ①韩… III. ①中国历史-研究-明清时代 IV. ①K24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89058号

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

著者: 韩毓海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承印者: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41

字数: 514千字

版次: 2018年7月第1版

印次: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 ISBN 978-7-5086-8904-3

定价: 12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 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我愿诚挚地将自己幼稚的工作，
奉献给养育我的父母人民，
特别是：

奉献给激发我写下本书第一行文字的那遍地英雄的山河，
奉献给在这块土地上默默牺牲和奉献着，
创造了伟大的“太行精神”的父老亲人。

因为——正是那些在历史的纵深处和现实的实践中奋力工作的人，
使我幼稚的写作成了一个声音。



2018年
版序言

本书第一版出版于九年前，这次再版，希望能够摆脱盗版流布的困扰，使广大读者能够更全面、更真实地评判本书的得失。借此，我对中信出版集团和广大读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鲁迅希望自己的书“速朽”，因为那是写于黑暗中的东西，而作者渴盼着光明。他甚至说，今人之所以喜读《水浒传》，就是因为今日之中国，依然还处在水浒的时代。

毛泽东曾说鲁迅是圣人，而只是谦虚地说自己是贤人。我等虽皆是凡人，但生在了中国和中国人出头的时代。我虽然对自己的作品没有自信，但对生我之时代充满自信。在这样的时代，我们做中国的学问，比鲁迅他们那一代人要幸运得多。

1917年，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说过一句话：“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他这里所说的“高深学问”，显然并不

等于知识，因为没有思想的知识，既谈不上高，也谈不上深，不过就是流水账而已。

1927年，陈寅恪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也说过一句话，叫作“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块碑，现在就立在清华园中。

但是，无论怎样提倡文化、高标学问，生于蔡元培、陈寅恪那种时代，他们对于中国文化、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理论，绝不会有我们今天这样的自信。王国维的自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出于对中国文化、中国制度之前途命运的绝望。

故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方才如此沉痛地说：“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不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

IV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正如陈寅恪悲哀自嘲的那样，如果中国的制度已经毫无前途，则所谓中国文化、中国思想，究竟何枝所依，何事所凭？如果连中国都没有了，则研究所谓中国学问，也不过就是讨辞赋、寻章句而已。

其实，蔡元培、陈寅恪当年对思想与学问之“自由”的理解，有很鲜明的启蒙主义或德国古典哲学色彩，它的根源就在于所谓的“人有自由意志”，而所谓自由意志，在他们看来，也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在与恩格斯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说，所谓“人的自由意志”的发展，不过就是指人类“生产与交换能力”的发展。人类在生产与交换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发展着自己的社会制度，因此，不研究社会制度的发展，

思想和知识就没有着落、没有落脚点。

学问和思想从来就是附丽于制度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上其实并不存在所谓与社会现实相脱离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高标“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说白了其实就是生活在那个中国文明黑暗时代的读书人“无地彷徨”的无奈之语。因为那个时候，无论改革旧制度还是创造新制度的力量，都还尚不具备。

本书的主题是研究近代以来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通俗地说，就是研究近代以来中国的制度改革与革命。本书的主要线索是：从地缘政治变革的角度观察近代世界交往方式之变迁，从财政金融的角度思考顶层制度之改革，从基层组织的角度研究国家社会组织能力之革命。

我的学长袁纯清曾说，这本书的最大优点，就在于采取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方法。

我既把他的话说作最大的褒扬，也将之视为学习和努力的目标。

今天看来，本书当然也有许多缺点与不足，而其最大的不足在于：考察名物制度的学者，并非现实中的实践者，而离开了波澜壮阔、艰辛曲折的生动实践，离开了饱含切肤之痛的斗争、付出、牺牲与收获，学问终究是纸上的学问，学者难免陷入迂阔和理想主义。我一向以为，历史上那些切中时弊的奏章、手札之所以比“四书”更具影响力，就是因为其作为破解现实问题的措施，比抽象的原理更有力量。

矛盾、变化是绝对的，而范式是相对的，从历史上看，我们不是一般地缺乏知识，而是缺乏有关行动的知识。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我今天深刻地感受到：写好一本书，与为国家和人民办成一件事。

事，哪怕是歷史進程中的一件小事，比較起來，其價值“相去之遠，何啻於十百千萬也”。

在書里磨，與在事上磨，畢竟還是不同。本書之所以至今還有價值，就是因為它並不是一般的關於歷史的著作，而是關於歷史上的改革與革命的著作，它提供的是有關行動的知識，是有關歷史運動的知識。

能寫出一本 50 多万字的書，我感慨、驚詫於自己青年時代的勇氣與毅力。“季子正年少，匹馬黑貂裘”，那時可以數天連續通宵工作的我，可曾想到自己也有“可憐白發生”的時候？

一部學術著作是否有價值，並不取決於它是否符合當下手造的所謂“學術規範”，而在於它能否經得住歷史的考驗。所謂歷史的考驗，就是指面對那些歷經歷史滄桑而沒有解決的問題。王安石的文章不可謂不多，但今天讀來還能昭聳發聵的，不過就是《上仁宗皇帝言事書》。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是否有價值不好說，但是，今天我們依然不能懷疑《上清帝第一書》的價值。

所謂“學術生產”也能創造出“剩餘價值”的原因，庶幾在此。

九年波瀾壯闊的歷程，對中華民族、對我們的國家來說是偉大的長征。學術不可能超越實踐與變化，學術工作不過就是拼命努力去抓住歷史變化的“剩餘”而已。

“開元爆竹第一聲，鐵馬冰河入夢中，眼底戰國成爭鹿，天下英雄孰臥龍。五百年來重寫史，兩萬里後再長征，眾手扶起唐社稷，滄海橫流東方紅。”

我希望自己能夠保持青年時代那樣的工作熱情、那樣的拼搏精神，希望自己能夠跟上時代，永遠不要掉隊。

现在交到读者手上的第三版，主要对原书的理论部分做了增订。特别是下篇的第四节（从康德到列宁）、第五节（作为“中国方法”的《大同书》）中，原来只是略略提到的许多论点，现在都做了进一步的阐述。

如同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一样，康德、黑格尔、康有为的著作，今天已被当作十分古旧的知识，人们怀疑它们与现实究竟有何关系，还能派上何等用场。实际上，这种怀疑是从这些著作诞生伊始就存在着的。例如，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一直被批评为“文字粗拙晦涩、令人无法了解”，文德尔班甚至这样说过：“能了解精神现象学的那一代人早已死绝了。”¹

在实用主义的时代，像怀疑一切不能直接变成钱的东西一样，人们普遍怀疑“理论”的价值、“理论”的用处，这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当年的左文襄公曾经感慨地说：“今之农者，亦如今之学者，欲速见小，自误而以误人。吾三十以后，读书渐多，阅世渐深，知区区之存于心中，自以为是者，仅足以仿当今无足指数之人，而于古之狂狷尚未逮也。”²这些话若换成今天通俗的说法就是：所谓实用主义学风，便是“小农经济”在思想、学术领域中的反映。它的表现也就是左宗棠所说的“欲速见小，自误而以误人”，更进一步说，它导致我们的发展没有坚实的基础、长远的眼光和持续的内在动力，更导致我们日渐丧失了“理论”这个改造世界的有力武器。

马克思曾经这样说到他自己所处的时代、说到那个时代的德国：“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抓住了活人！”实际上，马克思所说的，也就是我们的时代和我们当下的处境：今天，不仅肆虐全球的资本主义大危机使我们受苦，而且旧的生产方式、旧的发展方式同样也深深地束缚着我们，使我们受苦。马克思的时代其实离我们并没有那么遥远，而上述那些被判为“古之狂狷”者——康德、马克思、康有为，他们的写作所针对的，实际上也便是我们的现实，他们能够告诉我们的，比当下的时尚宣传所能给予我们的要多得多。

今天的人们似乎已经忘记了：正是康德第一个指出，英国人率先发明的“战争国债”和战争金融制度，乃是现代欧洲思想错误的结果，是西方思维最大的失误；而黑格尔则认为，推动现代西方世界发展的两个真正动力，无非是战争与财富；尼采更一针见血地指出，“债务关

系”乃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正是马克思指出，在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之后，一切旧的经济学实际上都已经死亡了，因此，从今往后，我们需要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学；而列宁认为，金融垄断和跨国公司的垄断，是20世纪世界经济的主要特征；康有为则第一个提出了“大同”“小康”之辩，他说，未来的“大同社会”，必定是以劳动者为主体，以科技、思想和知识创新为动力的社会，必然是“劳动社会”和“创新型社会”。

这些被判为“古旧”的知识、这些晦涩的理论，恰恰是今天我们认识、改造现存世界的最有力武器。

二

本书第一版面世不久，就有学者希望我谈谈“理论叙述”与现实、历史叙述的关系问题。在一些读者看来，本书的上篇以现实、历史叙述为主体，而下篇则似乎更侧重于“理论”。对这个问题，其实再也没有人比马克思阐述得更好了。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他便深刻地谈到了究竟应该怎样对待“理论”这个问题。马克思谈到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谈到了这个有史以来最大的“理论狂人”，他这样说：在黑格尔那里，理论“是现实事物的造物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与黑格尔不同，马克思自己则把理论当作人的思想和语言活动，马克思说，他自己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活动的人”。人的实际活动就是生产与交往，随着人类生产与交往活动的发展，人类形成了不同的社会制度，而离开了对制度的研究，

所谓理论与思想乃是“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自新教改革以來，德國人所理解的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自由意志的發展。馬克思認為，人的自由意志的發展就是生產與交往活動的發展，因此，“只有在現實的世界中並使用現實的手段才能實現真正的解放；沒有蒸汽機和珍妮走錠精紡機就不能消滅奴隸制；沒有改良的農業就不能消滅農奴制；當人們還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質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證的時候，人們就根本不能獲得解放。‘解放’是一種歷史活動，不是思想活動，‘解放’是由歷史的關係，是由工業狀況、商業狀況、農業狀況、交往狀況促成的”。

所謂理論敘述與歷史敘述的統一，只能是對制度形成與發展的研究所，我以為這就是本書所堅持的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

X 離開了歷史變化的理論，與其說是抽象的，不如說是僵化的，這就是中國人所说的命數、天理與時勢的關係。這裡的時勢，不僅僅是指中國歷史的變化，也是指世界歷史的變化。今天的中國，依然處在自 16 世紀以來歷史巨變的大周期之中，因此，我們必須從廣闊的時間與空間的角度審視我們今天的發展。

三

長期領先於世界的中國，為什麼會在 19 世紀走向衰敗和落伍？長期處於戰亂分裂狀態的歐洲，為什麼會在 19 世紀後超越中國、領先世界？這是一個極其重要的課題，在世界學術界，它被稱為“李約瑟之謎”（在當代中國學術界，對這一問題的回應主要是技術性的，並深刻地受到“現代化論”的束縛，例如，有中國經濟學家認為李約瑟其實

只是提出了两个疑问：其一，为什么中国科技水平和经济发展在历史上一直遥遥领先于其他文明？其二，为什么中国科技水平和经济发展现在不再领先于世界水平？³）。本书的基本目标之一，便是以上述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去回应这一课题。

许多杰出的学者已在破解这个谜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如安格斯·麦迪森的《世界经济千年史》，以及伊懋可关于“高度平衡陷阱”的重要论断。按照麦迪森的统计，中国经济在1000年里一直保持持续增长，并在1820年左右达到了世界经济总量的1/3⁴；尽管如此，中国经济的增长却一直是依靠不断增加的劳动力投入维持的，而1500年之后，西方经济的增长则主要是依靠技术、生产方式的创新实现的。如果说西方经济1500年之后的增长体现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的话，那么观察同时期的中国，却会发现经济增长伴随的乃是劳动生产率的下降，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人口很少的西方却创造了越来越多的财富，并最终超越了中国。

麦迪森和伊懋可的论断，就“李约瑟之谜”给出了一个典范性的解释模式，但是他们的解释也遭到了两个方面的有力挑战。一个挑战就来自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西方经济的增长方式受资本积累这个基本目标的制约，这使得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排斥人类劳动的弊端。同时，西方经济在1500年之后的飞跃增长不仅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而且是近乎无偿地占有当时还很廉价的世界资源的结果，包括无偿占有美洲、印度的农产品，以及世界上绝大部分的矿产品。西方经济的增长带有掠夺自然的特性，并与残暴的殖民主义统治相联系。因此，从排斥人类劳动和掠夺自然、殖民地这两个方面来看，西方经济19世纪的增长方式也是不可持续的。

另一个挑战是伴随着 1950 年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开辟，特别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东亚经济的持续起飞而产生的。这个学派把新中国的发展，以及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东亚经济“奇迹”，解释为东亚具有大量高素质劳动力的结果，是这些优质劳动力通过建立合作型社会，创新西方单一竞争型模式的结果。他们认为，这条以农业为基础，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互相促进、协调发展的道路，既接续了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推崇的“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之路”（斯密认为这条道路为英国的“工业革命”所中断），更是对人类现代发展方式的创新。与排斥劳动和就业、依靠自然资源的大规模耗散、通过掠夺殖民地谋增长的“工业革命”不同，其被称为“勤劳革命”。

XII

许多西方学者从劳动力的“质”而非“量”的角度观察中国的劳动力优势在持续发展中的作用，他们认为，“与普遍的看法相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资的主要吸引力并不是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资源，而主要是这些劳动力在健康、教育和自我管理能力上的高素质”，而且，这种质的优越性与中国长期坚持的社会主义道路分不开。如萨米尔·阿明认为，在中国，农民与土地的直接结合使中国能够创造新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必然与只能用贫民窟和失业来解决经济危机的资本主义逻辑完全不同。⁵

本书的基本探索之一，就是对“李约瑟之谜”提出进一步的、不同的解释。这种解释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方面是地缘政治性的。自 10 世纪以降，在中国的推动下，逐步形成了横跨欧亚大陆，联系东洋、西洋和南洋的贸易与金融流动体系，其中，以恰克图为核心，贯通“内陆欧亚”的北方贸易体系和以

琉球为核心，联系东洋、西洋和南洋的海洋贸易体系，乃是以中国为核心的世界体系的两个重要枢纽。16世纪中后期以降，随着美洲白银的输入和帝国主义军事扩张的加剧，随着世界地缘政治态势的大变动，以中国为核心的世界贸易和货币流动体系最终于19世纪走向瓦解。中国那时的衰落，首先是上述世界地缘政治态势变动的结果。

第二方面是金融性的。它基于一个简单的事实：尽管在10世纪之后中国社会就开始进入“近世”，但自宋、元、明、清到中华民国长达数百年的时间内，由于长期实行经济、社会的放任主义，中国都没有自己的自主货币。宋代经济已经依赖南洋、西洋舶来的白银，而自明隆庆元年（1567）起，从美洲大量进口白银和银元，更成为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与货币短缺矛盾的基本国策，从而使得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依赖美洲的白银供给。这成为阻碍中国长期发展、实现革命性发展的重要瓶颈。

魏源早就深刻指出：“人知中国之银出漏于外洋，而不知自昔中国之银大半来于外洋”，“而近数百年间，钱粮改银以后，白金充布天下，谓非闽、粤番舶之来，何自得之”，“银之出于开采者十之三四，而来自番舶者十之六七”，“银来番舶数千年，今复为番舶收之而去”，“中国争用西洋之银钱，昂于内地之银值，则中国银币行之数百年，亦必因时而当变”。因此，魏源倡议：中国欲求富强，必先从国家自铸货币，驱逐西方银元始。⁶近代中国改革的先驱者康有为上清帝的第一份奏折，就是《钱币疏》，其中即提出中国400年均没有国家主权货币，指出货币供给依赖外洋所造成的“失名、失实、失用”，乃是“旷世之大弊”，康有为更首倡“废两改元”，即废除银两，改行国家铸造、发行的银元为主权货币。⁷中国改革的先驱者孙中山的革命目标之一，也

便是“货币革命”，但是，直到1935年，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才力图废除白银和银元而发行国家货币——法币。法币的发行没有当时中国经济的主体——农业经济的支撑，也难以深入中国的广大农村，故不得不以外币为“准备金”。法币既与英镑汇率挂钩，又以美国的“银本位制”为基础，这种在列强之间“左右逢源”的币制设计，却因独将日本排除在外，竟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重要借口。法币发行，终致20世纪40年代严重的通货膨胀而陷入崩溃。

因此，与1500年以降的西方相比，中国经济的增长缺乏国家财政组织、金融战略的有力支持，这是它陷入发展困境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方面是政治上的，具体地说就是“国家组织能力”上的。宋代以降，经济和市场的不断发展与国家组织能力的持续下降这一矛盾现象，是我们观察历史得出的第三个基本结论。

XIV

中国政治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宋代以降之所以出现了国家组织能力下降的问题，其根源就在于国家治理能力的全面下降。中国的士大夫阶级，自那个时候起，就已经不再能够担负起一个逐步近代化的国家的治理之责，即他们既没有管理经济、财政、税收、司法、军事和金融的具体能力，也不再能够担负起组织人民、教育人民的责任。华而不实、日益腐化的士大夫阶级，已日益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阻碍力量，而中国的基层治理早已落在了横征暴敛的胥吏手中，即从那个时候起，中国其实已经出现了管理者、治理者“缺位”的危机。

被列宁称为“11世纪伟大的改革家”的王安石，在其政治名篇《上仁宗皇帝言事书》⁸中率先提出了中国面临着严峻的政治危机这一重要课题。面对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和强敌入侵的压力等多重难局，宋王朝暴露出的核心问题并不是缺乏经济能力，而

是整体上丧失了政治能力。

王安石指出，宋王朝没有政治。这就是说，国家没有真正的治理者。儒家文化的根本缺陷在于其目标是培养“圣贤”和文人，而非日益近代化的国家治理者。儒家学说作为政治学是不合格的，因此，在这种思想文化体系中培养出来的官员，作为“治理者”也都是不合格的。王安石的文章开篇即痛陈中国“没有人才”，而他所谓的人才，并不是指文人，而是指治理者，并不是指儒家意义上的“圣贤”，而是指政治家——治国理政的人才。他认为儒家文化培养出来的只能是口吐莲花的文人和独善其身的“贤达”，而不是治理者，这就是他所谓：从造就治理者的角度看，儒宗学说之于人才的“教、养、取、任”，皆不得法，甚至可以说是一塌糊涂。

王安石之所以被称为“中国政治改革的第一人”，就是因为他提出了培养、选拔、约束和监督治理者的一整套办法，即他力图将治理者从“文人”和“圣贤”中剥离出来，形成一支职业化的治理者队伍。从今天的角度来说，他的这一举措可以被称为“政治的理性化”。

王安石希望造就一支职业化的治理者队伍，以此加强宋的国家能力，然而，在与庞大的士大夫阶级的对抗中，他失败了。像中国此后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一样，王安石的改革也是自上而下的，这种改革无一例外地不能触动中国基层，尤其不能触动长期把持中国基层税收、司法、财政和军事的基本力量——胥吏阶级。

胥吏是从唐代的“役法”中演变而来的。按照役法，基层的事务是由人民轮流担职处理的，国家并不发给俸给，而唐中期以降，基层事务已由专任的事务员把持，他们的收入不是来自国家，而是来自办事获得的“好处费”。这种把持基层的事务员，就是胥吏。